



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肩负大任，工作繁忙。但这没有妨碍他对儿女们的关顾眷爱。书信便是他与儿女沟通交流、传情达意，表达父爱的重要方式之一。透过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给孩子们的部分家书，信内信外、话里话外，装满了爱。这种爱，多元而丰富，博大而深沉，浓烈而醇厚。这种爱充满人性光辉，展现父爱智慧，彰显辩证思维。毛泽东家书是毛泽东留给其家人和世人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

严慈相济

毛泽东疼爱每个儿女，关心其成长进步。他也赢得了儿女们的敬重。爱妻杨开慧早年惨遭杀害，幼子毛岸龙不幸夭折，能活下来且健康成长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成了毛泽东的至爱。1938年3月4日，得知有人去苏联，毛泽东放下手中事，赶紧给儿子写信。开头便是“亲爱的岸英、岸青”，非常亲热。“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我是盼你们来信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1946年1月7日，得知毛岸英由苏联回国，毛泽东喜出望外，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当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毛泽东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

从家书看毛泽东如何做父亲

□ 朱广联

抱住了儿子。喜不自禁地说道：“你这么高了！”岸英到延安没几天，父亲提议，儿子爽应，去一所新式学府“劳动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棵好苗子，但要多经受摔打和锻炼，尤其是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岸英明白父亲的心，他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到陕北吴家枣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儿，很快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几个月下来，“白胖子成了黑胖子”。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后又安排岸英去山西土改工作团，参加搞土改试点。“两个月的收获比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毛泽东为之感到欣慰。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深情地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很深刻。岸英将其视为“家训”和“座右铭”。他决心好好干，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岸英第一个报名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态支持。后来当得知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时，毛泽东悲痛万分。哀痛之余，毛泽东批准将岸英的遗骨埋葬在朝鲜，埋葬在他战斗过的地方。毛泽东用无声的泪和无言的语，诠释了一位父亲伟大而崇高的家国情怀。

相对于岸英要求上的“严”，毛泽东对大儿媳刘思齐，展现的是更多的“慈”。不是己出，胜似己出。他在家书中常常直呼“思齐儿”“女儿”“娃”，有时以“亲爱的思齐儿”相称，意在给“女儿”以更多的父爱，

缓解她失去丈夫后的孤寂和苦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齐之苦，毛泽东决定出“大招”，施“猛药”，帮助儿媳早日走出困境。1961年6月13日在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为何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这位日理万机的公公，百忙中再度关心儿媳的改嫁再婚之事。且言辞恳切，并作跟踪，令人动容。对这份不寻常的父爱，思齐曾感慨道，“岸英牺牲以后，爸爸关心我的思想、学习、工作、健康……到后来，他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的婚姻……”1962年1月，得知刘思齐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即将喜结连理，毛泽东很高兴。欣喜之余，手书新创作的《卜算子·咏梅》送给思齐，作为给女儿的新婚贺礼。结婚那一天，又派叶子龙给思齐送去300元，作为陪嫁的礼金。如此父爱，令人生敬。

显爱与隐爱

毛泽东对儿女之爱，在其信中有时浅显直白，读来亲切温暖；有时婉转含蓄，需要细细品味。“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欢迎你来。”这是1949年毛泽东用加急电报给爱女娇娇（李敏）发的回信。信中连用“想念你”“喜欢你”“欢迎你”等滚烫的词

语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怜爱和对父女团聚的期盼，很是感人。毕竟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后唯一幸存下来的爱情结晶。1949年5月的一天，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离别8年的女儿娇娇见面了。当听到一声羞涩而甜蜜的“爸爸”时，毛泽东激动地抱起娇娇，亲了又亲，喃喃地念叨“娇娇，我的小娇娇啊……”

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从毛泽东给儿女的书信情况看，总的看数目不多。但是凡动笔，必是情意满满，期待多多。从查阅的相关资料看，毛泽东写得较多的当是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刘思齐。其中，给小女儿李讷算是写得最多。仅1954年7月至1963年1月间，毛泽东给小女儿就写过8封信。这当是“大娃娃”从“小爸爸”那里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吧。其中，不乏毛泽东对李讷身上时有的“娇娇二气”给予的教育和引导。

写信最少的当是对二儿媳邵华。因为自邵华与毛岸青成婚后，这位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常有机会与爸爸在一起谈历史、叙文学、论古诗，面对面的畅叙交流，书信来往少便成自然。但是，1962年3月的一天，正在南下视察的毛泽东，利用清晨时间，专门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家书，且有些特别。“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养好身体，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子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署名“父亲”。时间为“三月六日上午七时”。这篇正文不到60个字的短信，没有抬头，未见昵称，且以“余不尽”戛然收尾。却是一篇分量很重、含金量很高、影响邵华和岸青一生的家书。原来，这与岸青的病体和小两口一段时

间发生口角、闹小矛盾有关。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毛泽东的家里何尝不是！父亲在外闹革命，母亲被害后，幼小的岸青和哥哥岸英一度流浪街头，受尽苦难。动辄遭人欺负，甚至挨打。岸青早年得了严重的精神和神经方面的疾病，日常生活中不能受一点刺激。小两口过日子，怎能没有点小矛盾乃至磕磕碰碰的事？当两人都向父亲诉苦、“告状”时，在情感和心理的天平上，毛泽东更多地希望儿媳邵华能有所改变，多些理解和包容，和岸青一起好好过日子。于是有了上述家书。这封信，全篇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特别是“《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这10个字，却是笔力千钧，意味深长。《上邪》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古绝唱。诗中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喻指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矢志不移。父亲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告诉儿媳，夫妻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与君相知”，不离不弃，方显弥足珍贵。鼓励并期望邵华多体谅岸青的特殊情况，积极面对和担当，用美好的爱情化解和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烦恼。聪明的邵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至嘱，体悟到父亲的不易。决心改变自己，少些“女儿气”，多点“男子气”。渐渐地，邵华较之前豁达开朗很多，对岸青更加关心体贴，彼此间的感情愈来愈深。1970年1月，岸青和邵华生了个胖小子。这是毛泽东惟一的孙子，老人家为其取名毛新宇。这一年，毛泽东77岁。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对毛泽东来说，其父爱却是如山似海。家书中声声对“儿”的呼，对“娃”的唤，凝聚了他对儿女们的万千情怀和不舍。其特殊的经历、特定的身份和他那特别的家庭构成，注定了他常常要既当父亲又当母亲。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智慧，阐释父心，表达父爱。一篇篇充满情感的家书，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这位普通父亲、世纪伟人别样的风采和特殊的人格魅力。



文艺作品总是要包含着感情的浓汁，这“感情的浓汁”从何而来？艺术家首先要对描绘的对象充满感情，说一个人有情怀，其实就是说他对人、对事物充满了一种纯粹的、不掺杂半点功利与杂质的爱。

大画家吴弗之先生曾经画过一幅《甘蔗萝卜》图，说起这幅画，还有一段佳话。1958年春节期间，吴先生到杭州郊区笕桥参加了一个联谊会，有个农民特意到地里拔了自家种的两根甘蔗和几个萝卜送他，这让吴先生大为感动，一直念念不忘，到了秋天，他就画了一幅《甘蔗萝卜》图。画面里就是两根甘蔗和一小堆萝卜，甘蔗用墨线勾出，竖立在那里，节节饱满如刚出水的藕节。左下角是被草绳捆住萝卜秧子、带着红泥的四个圆萝卜，萝卜的线条勾勒得十分洒脱。甘蔗和萝卜，一高一低，一直一圆，构图符合吴先生一贯倡导的“一俯一仰，互相合”的意趣。加上在甘蔗梢头和萝卜茎叶上抹了淡淡的黄色和青色，淡雅而有回味，物趣和天趣相得益彰。

乡里乡亲来看他，带些自家种的果蔬，吴弗之先生就当成一件大事，还郑重其事地题款记述：“甘蔗脆而甜，萝卜肥又嫩，春节访兄，感此以为赠。春节参加笕桥手工农联欢会，承兄将辛勤所得果实见赠，偶作此以志不忘”。看得出，吴先生完全是以一个老农对待庄稼的感情，一个平屋居民品出菜根滋味的心情去观赏，表现自己的描写对象，这样，“景语”也就化作了“情语”。

吴弗之先生是花鸟画大师，除擅长梅兰菊竹、荷花、松鹰等传统题材外，稻、麦、棉、麻、瓜、豆、菜等农作物，甚至别的画家有意无意忽视的竹壳、药苗和生产工具，也都入之画图。吴先生的理由是：“野草闲花和农作物也应该画，尤其是农作物，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关系密切，他们对它也特别有感情和感到亲切，所以更不能舍弃它，同时这为花鸟画扩充题材，开拓天地。”由此可见，山川日月、花鸟虫鱼这些“无情物”，统统都注入了吴先生的感情，一幅画注入了情感，也就有了生命。

吴弗之先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田园、对劳作、对农民，自是一往情深。吴先生晚年曾和浦江岩头村农民张世煌保持了长达十六年的友谊，张世煌自学画画，经堂兄介绍认识吴先生后，每次到杭州，都在吴先生家落脚，少则住上三五天，多则住个把月，吃住都在吴先生家。吴先生总是认真点评他的习作，当他提出想考美院时，吴先生叮嘱他画画要有想象力，立意构图要有新意。张世煌落榜后，情绪难免低落，吴先生安慰他自学同样也能成才，而对学艺术的人来说，人格的养成尤其重要，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回乡前，吴先生还特意赠他一副对联：“不忘田园勤作业，且凭书画慰劳人”。这是吴先生对晚辈的告诫，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

《浙江日报》记者吴重生写过吴弗之先生的另一则旧事：吴先生去世前，住在杭州医院里，因是癌症晚期，身体已十分虚弱，同住医院的几位来自农村的病友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弗之先生，纷纷向其求画。吴先生不顾病体虚弱，执意在叠成方形的被子上，铺开纸，虽虚汗淋漓仍挥毫不止。家人劝他歇一歇，吴先生说：“画画本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农民朋友喜欢我的画，只要我还画得动，岂有不画之理？”作画到了这种忘我的境界，恐怕没有一笔不是从他心坎儿中流淌出来的。

对生活、对自然、对他人，吴弗之先生常怀感恩之心，“且凭书画慰劳人”，也因为有这份心，虽画的是百花小草、瓜果蔬菜，也使他的艺术具有一股浩大的气象！



张养浩是元代一个很特别的散曲作家。他的特别，不仅仅是因为他所作散曲多为深切同情民间疾苦之作，也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官员，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生命交付给了他所关注的百姓，他写下的，是对百姓生活的真诚感悟。

张养浩（1269—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二十岁起担任官职，曾为躲避官场凶险“乃变姓名遁去”，也曾主动远离官场，“七召不起”。他是个清官，正直刚强、政绩卓著、为官廉洁，两袖清风、四壁萧然，有官穷似无官日。

他感慨世事的盛衰无常：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双调·沉醉东风·归隐叹》）。

他认识到名利富贵的虚幻：富如何，贵如何，没来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人，皆笑汝，渠，干受苦。

他表示，要逍遥度日，不论是非，也不问世事：“任金乌搬炭兴，我只推不知道。”“唤蛾眉酒再斟，把春光且邀住。”甚至还正话反说屈原投江是“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他寄情山水风光：“对一縷绿杨烟，看一弯梨花月，卧一枕海棠风。”他试图在与山水的对话中，解脱纷扰和错乱，获得心灵的宁静愉悦：云山来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我爱山无价”“云山也爱咱”，分不清彼此，一如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一如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

其实，即便是高歌隐逸避世，他也并没有忘怀现实，没有忘记百姓，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当天历二年，关中大旱，民不聊生，朝廷要他去陕西行台就任、负责赈灾时，他毅然前往。《元史》记载：“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官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满城都道好官人

□ 韩希明



对于此次出山，他在一首散曲中表白了心迹：天上皇华使，来回三四番，便是巢由请下山。取索檀，略别华鹤山。无多慚，此心非为官。

不为官禄，只为百姓，这是张养浩的可贵之处。赴任途中，他走一路，看一路，感慨一路。用同一曲牌“山坡羊”，写下了《北邙山怀古》《洛阳怀古》《河池怀古》《潼关怀古》《骊山怀古》《未央怀古》《咸阳怀古》等篇。“怀古”实为“伤今”，批判的锋芒，直指历代王朝。这些咏史怀古之作，透视历代兴亡现象，指出民众创造历史，却又代代受害，表现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集中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比泛泛的盛衰之感受深刻得多。张养浩最为著名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秦宫阙，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华山的群峰像是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黄河的波涛如猛兽怒吼。凶险的潼关要道就在华山与黄河之间，遥望古都长安，秦汉的遗址令人伤心，曾经的万间官阙都化作了焦土。一朝兴起，百姓要出钱出力去建造宫殿；一朝灭亡，百姓流离失所，无论朝代怎样更替，都是老百姓遭殃。

张养浩驻足潼关，西望古都长安，心潮起伏。潼关，内有华山，

外有黄河，西有长安，东有洛阳，地势险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少朝代更迭，都曾在潼关发生战争。当年何等繁盛，如今皆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一片残垣断壁。这首小令的观点与以往赞颂盛世、控诉乱世的诗文迥然不同。作者的感情并没有停留于“伤悲”“踌躇”，历史的痼疾，被张养浩所独识、所针砭。他体察民情，体恤百姓疾苦，把百姓命运作为观察历史兴亡的着眼点，纵观世变，吊古伤今：一个朝代的衰亡，带给黎民百姓的是苦难，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带给黎民百姓的依然是苦难，一次次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改变百姓的悲惨命运。作品气势雄浑，感情激愤，折射出民本思想的光辉。

张养浩就任后，一心一意赈救灾民：亲登华岳悲哀雨，自舍资财拯救民，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比颜御史费精神。

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

乡村良善全性命，廩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中吕·喜春来》）。

《元史·张养浩传》记载：“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农夫大喜”。求雨而得雨，张养浩也喜不自胜：万

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

用尽我为民为国安，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

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

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霖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南吕一枝花·咏喜雨》）！

久旱逢甘雨，张养浩感到快慰，可是想到老百姓仍处于困境之中，不由得深切悲悯和同情。

张养浩为官多年，官场、世态所见甚多，所以他的一些“警世”之作，写得生动形象，又意味深长。如《中吕·朱履曲（警世）》：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吃些筵席，更不可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橐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张养浩散曲题材之广泛、思想内容之丰富、社会效果之显著，在元代散曲作者中独一无二。在元代散曲作家中，像张养浩这样勤于民事、哀民忧民而以身殉职的，独一无二；像张养浩这样一语道破老百姓千年悲苦的，也是独一无二。

